23.06

梓潼文史资料选辑

（“梓潼解放纪实”专辑）

第 6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梓潼县委员会
编　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此本五册）

· 在梓潼地下党的日日夜夜
· 贺龙在梓潼
· 解放前梓潼的种烟、贩烟、吸烟和禁烟
· 梓潼哥老简述
· 解放前的教育概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梓潼文史资料选辑》第六期

目　录

在梓潼地下斗争中的日日夜夜……王　岳（1）

关于贾文光同志被捕的一些情况……胡奕民（18）

梓潼解放……周朝海（19）

贺龙元帅在梓潼……赵邦雄（22）

我们见到贺龙元帅……赵德一等（26）

原国民党76军在梓潼放下武器始末……郭志修述、张明荣整理（27）

贾文光烈士的青少年时代……史元学（31）

东禽寺剿匪记实……邢生财（33）

回忆我临解放时的经历……陈仁文（35）

梓潼县解放初期的供应站……罗守福（38）

我对黎明前的回忆……赵德一（39）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转变……赵德一（42）

支前会在马鸣乡的活动……钟云鹏（43）

解放前教育述略……苏厚泽（44）

解放前的种烟、贩烟、吸烟和禁烟……杨开达、赵邦雄、刘长荣（46）

梓潼哥老简述……马春林、蒲俊礼、刘长荣（51）

解放散记四则……雷从泽（55）

解放前梓潼北门外江家茶馆门口丢手榴弹事件……马春林（57）

一贯道在梓潼的罪恶活动……任运明、王勤（58）

阻击溃军……张天培（62）

解放前后回忆……罗守忠（62）

励进学述研究会……仇世增（64）

补白四则：

1、梓潼天主教起于何时

2、古人咏梓潼诗三首

3、王驾业诗二首

4、唐玄宗、唐德宗幸蜀均经过梓潼……刘长荣

本辑编辑小组：谢汉杰、刘长荣、仇世增

封面题字：谢汉杰

校　　对：仇昌仲

在梓潼地下斗争中的日日夜夜

王　岳*

一、到梓潼之前

我到梓潼之前，在江油“四川省立农业职业中学”教书，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党内任农校支部的书记。农校支部计有党员十多个人，除我和一名充当职员的米维邦同志之外，其余都是高中部高年级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些是来自川陕公路沿线如剑阁、梓潼及其侧近的盐亭、三台等县的农村贫苦青年。

1949年春，我人民解放军继取得举世震惊的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又取得平津战役的辉煌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已面临总崩溃的前夕，全国解放在望。我地下党川北工委和绵阳中心县委为配合全国形势的发展，积极调配力量，决定动员江油农校中家在各地农村的党员返回原籍，借助他们熟悉本地情况的有利条件，及时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迎接解放。梓潼县的米维邦、陈子静、罗仕杰，盐亭县的杜天碧、黄仕钰，三台县的龚珍甫、刘少富，安岳县的安治民以及剑阁县的两名党员，接受组织上的调动，陆续在暑假回到了他们的家乡。临走前，分别给他们布置了回去开展工作的任务，除了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之外，可以在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同时和他们约定组织关系的地址和“暗号”，静待组织上派人去同他们联系。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随后我也被调离江油。

1949年6月，农校快放暑假，川北工委委员兼绵阳工委书记王朴庵同志通知我去绵阳，告诉我：鉴于我在农校的活动有所暴露，已经引起校方的注意和国民党的怀疑，决定把我调出江油。他嘱咐我安排好农校支部的工作，交出几个继续留在农校的江油籍的党员的关系，由他派人去联系；同时叮咛我不要向任何人暴露我将离开江油的痕迹，随身的行装、衣着要尽量简单朴素，准备下乡。

于是，我赶紧作各种准备。首先，通过潜伏在江油伪县政府民政科的党员李长林同志弄到三张空白盖印的“国民身份证”，名字由我自己填写。其次，清理出几件半新不旧的土布长衫、短褂同一床薄被，捆成随手可以提走的行李。这件事，瞒不过我家里的人，特别是我的母亲。因为我借口向她说我要辞去农校的职务，应几个好朋友的邀约去安县一个偏僻的农村中学教书，穿着朴素一点好。我母亲是个细心人，把我的行装统统翻了一遍，总觉得太寒酸，认为教书先生不能穷酸到令人瞧不起的地步，硬把一双刚上脚的皮鞋塞进我的行李。我的父亲则说，何苦要放弃农校待遇优惠的“专聘教员”的职务跑

---

*王岳：原中共地下党江、彰、平、梓、盐工委副书记，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亚州研究所副所长。

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呢？他对我的离家行为百思不解，却又没有硬性阻拦。最后，考虑到地下党经费困难，我把在农校教书积攒的工资，凑成二十几块银元，随身带上以备不时之需。

当农校期末考试完毕，我趁人不知，悄悄离开江油，到了绵阳。这时才知道王朴庵同志决定调我到梓潼，给我的任务是：从农校疏散到剑阁、梓潼、盐亭、三台一带农村的党员，都由我去给他们接上组织关系，分别建立党的支部或者小组，就地开辟工作，这些同志留给我的地址，也由我随身带去。我在绵阳住了两夜，把三张“国民身份证”，化为“王文经”、“岳文经”、“汪显中”三个名字填上去，藏在行李和身上不同的地方。“王岳”这个名字，就是解放时把“王文经”、“岳文经”两个化名的姓并起来的，我原先上学和后来教书的名字就从此弃而不用了。

一切准备停当，王朴庵同志指示我先去接上梓潼、盐亭、剑阁、三台的几个党员的关系，初步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然后按照他约定的时间到梓潼城内碰头，让我同梓潼地下党的负责人见面。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乘长途汽车从绵阳到了梓潼。

二、初到梓潼和盐亭安家场之行

乍到梓潼，人生地不熟。我用“王文经”的化名，在城内川陕公路穿过的大街上的“西川旅馆”住下。这家旅馆是当时梓潼最大的一家旅馆，每天都要接待不少南来北往的旅客，，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我感到这是了解各种情况的极好场所，就一连在这家旅馆里住了三天。在这三天当中，我同旅馆里一个年纪较大的“茶房”也混熟了，我告诉他，我是到广元、昭化一带买山货的“生意人”，他因而对我特别殷勤。闲聊中我问他，剑阁、盐亭、三台这一带山沟里还有什么生意可做？顺便从他嘴里打听我要去的几个地方的方向和里程。三天过后，我借口要到山区去看货，把行李托付给他，给了他半块银元的小费。他感激不尽，一直把行李替我保管到解放。

这时正值雨季节，当我决定动身去盐亭安家场的那一天，早晨下起雨来，不得已临时到街上买了一把大号油纸雨伞，尚能遮住半个身子，脚下没准备，只好穿着布鞋上路了。从梓潼出了东门，我想先去定远乡的斑竹槽找罗仕杰较为适宜，因为去盐亭可以经过斑竹槽，一打听，到斑竹槽要翻大茅山，路途不熟，便边走边问，哪里知道，雨越下越大，道路也愈来愈泥泞，路上几乎遇不着问路的行人了。到中午时分，雨渐渐停住，才有几个躲雨的人从一家屋檐下钻了出来，也是朝大茅山去的，我就跟在这几个人的后面上了大茅山。大茅山腰路边上有个卖锅魁、凉粉的小摊子，还有一处卖茶水的，我在这里随便坐下吃了点东西，再向人打听去斑竹槽的路径。有的人指点说，顺着大茅山的山梁朝南走，是一条小路，比走大路近好多，于是我就从这条小路走。这一路不少地方长满了齐膝的茅草，雨后全沾上雨珠，走了不到七、八里，我下半身的衣裤都给茅草上的雨珠浸湿了，脚下的布鞋灌满了黄泥浆，又重又凉。我这时真有点发慌，想着万一这一天找不着罗仕杰的住处该怎么办？因为路上连一个歇脚的地方也没有，而时近黄昏，天慢慢暗下来了。

走到羊肠小道的尽头，眼前亮出一片姜石子土坡，有几处被人开垦出来种上红苕。我顺势爬了上去，举目张望，坡下的树丛中半隐半露的几间泥墙瓦屋，远远还听到几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狗吠。我溜着脚步滑了下去，走近一户人家，一眼认出站在墙根下的几个小伙子当中，一个人竟然是罗仕杰，万万没有想到这么顺利就找到他了！罗仕杰看见我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也没有想到组织上派人来给他接关系的正是他在江油农校的老师，赶忙把我迎进他家的堂屋，替我烘烤被雨水淋湿了的衣裤鞋袜。

一经打听，原来我早已绕过了斑竹槽，这里已是梓潼和盐亭交界的罗家湾。我们还来不及谈话，他家里的人听说来了客人都赶了回来，罗仕杰向他们脱口介绍我是他的“老师”。这一下弄得我只好临场应付，借口说我在暑假中要去川北阆中看朋友，顺路来看望一下学生。这样说，倒使他家里的人对我更加尊敬起来，吃罢晚饭还陪我坐了好一阵。夜里，我想，事先我没有给罗仕杰打好招呼，暴露了我在江油教书的身份，这里就不能是我今后常来之地了。

第二天，趁他家里人不在的时候，我才详细向罗仕杰问明他从农校回来后的活动。他给我谈到斑竹槽周围农民的吃穿十分困难，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有个翻身的日子，他交往的几个穷朋友，其中有两个政治觉悟较高，可以作为党员发展对象，正在加紧培养。同时，告诉我，黄仕钰就住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我急于找一个稳妥的落脚点，赓即要他带路去找黄仕钰。

翻过几个山坡，我们就进入了盐亭地界，在一个山沟里，仅仅十几户人家，我们找黄到仕钰的住处，出来招呼我们的是他的妻子。进门一看，他这里同罗仕杰的家比较，就狭窄多了。除了一个摆饭桌的过道之外，只有一间不通风的卧室，床上的帐子破得大洞小洞，穷得算是可以的了。我们歇了口气，在门外坡地上找到黄仕钰，他脱光了膀子正在一块旱地里给庄稼薅草施肥，背脊梁晒得黧黑。据他说，他这几年为了上学读书，全靠他的妻子在家操持，暑假回来才能带着妻子下地做些农活。趁这个时候没有外人，我同他约定我们是农校的“同学”，姓“岳”，别再叫我“老师”，以免引人怀疑，以后我再来这里也才方便。这算是我从罗仕杰家里出来吸取的一点教训。

黄仕钰照我的吩咐办了，午饭时碰见他的几个邻居来，经他介绍，这几个人对我们很自然，并不怎么奇怪和客气。饭后我让罗仕杰回去，黄仕钰单独向我汇报了他从农校回来后的工作。他告诉我，他这里是梓潼、盐亭、三台三县交界处，地点偏僻，住的都是贫苦农民，保甲势力也弱。他串联了几个农民，其中一个叫杜华云的，条件比较成熟，建议我考察一下这次就当面吸收入党。但杜华云缺乏文化，写不出书面的入党申请，只能口头表达他的要求了。等黄仕钰找来了杜华云，一看是个憨厚的壮年汉子。经谈话了解，他原先是大川北巴中、苍溪一带的人，流落到盐亭在一个姓杜的家里入赘，是个上门女婿，社会上和家庭里的地位形同长工，常常招人白眼，受窝囊气，早就想离家参加革命。他表示别的工作干不了，跑路的事完全可以承担，叫他干啥他就干啥，拼命也行。杜华云的话不多，倒反映出一个农民具有的朴素的真实感情。经进一步谈话，才知道他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小鬼”的时候，曾经见到路过川北的红军，从红军那里懂得一点贫苦人要翻身只有跟着红军闹革命的道理。根据这次谈话，同时考虑到需人协助黄仕钰在农民中开展工作，当即决定由黄仕钰介绍，吸收杜华云入党，布置他多给贫苦农民宣传翻身求解放的道理，组织上由黄仕钰领导。

接着，黄仕钰带我到三台县境内的龙树乡去找龚珍甫和刘少富，继而折返盐亭安家

场去找杜天碧。龚珍甫的家住在乡下，是个自耕农，条件同罗仕杰那里差不多，交的朋友多半是小知识份子，但工作进展不大；杜天碧住在安家场镇上的大路边上，逢场的日子来往的客人较多，他家里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其中还有一些袍哥。

安家场背靠丘陵，梓江顺延而过，集镇上有几处贩运杂货的店铺和客栈。堪称是个小小的水陆码头。镇上读书认字的人不少，还有几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学生，出身于比较殷富的人家。我想在这里多了解一点社会状况，就以杜天碧的"同学"关系在他家里暂住下来。一天，杜天碧带来一个叫袁公卓的朋友，年纪大约三十出头，刚一介绍，他就向我提出入党要求。我一下感到突然，估计杜天碧已向他泄露了我的身份。也就不再回避，坦然问他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袁公卓年纪较大，看来也较世故，他倒反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袁诗荛的共产党员？对袁诗荛，我当时确实知道得不多，只晓得他是早期的党员，大革命失败之后在成都被四川军阀枪杀的烈士。我们就以袁诗荛的故事为题，作了第一次谈话。

事后，我向杜天碧了解，才知道他在同袁公卓的交往中，不仅泄露了他的党员身份，也泄露了我在江油农校教书的真实姓名。我为此责怪他，对袁公卓申请入党的事从来没有汇报过，临时把人带来实在唐突。既然到了这一步，就叫袁公卓写一个自传交来再说，不隔两天，杜天碧把袁公卓的自传拿来，还带来了他的申请书。我看过之后，约定日期同杜天碧一道去了袁公卓家。

在同袁公卓第二次谈话时，我详细了解了他的经历和家庭以及社会关系，发现他的家庭是个地主，同安家场上层人物交往较多，与袍哥组织"九成社"也有关系；但他1945、1946年间在安家场的"为公中学"上学时接触过进步朋友，受同乡邓石澜的影响，读过一些进步书刊，随着抗日战争后局势的发展，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不满，对共产党寄予希望，因此才产生找党、入党的愿望。他对我一到安家场就有所猜疑，因而向杜天碧打听了我的底细，主动提出了入党要求。考虑到袁公卓的经历需作进一步调查，为了慎重一点，我向他表示，尊重他入党的愿望，但要等我向上级领导人汇报之后才能作决定，希望他在上层社会中多多了解一些人的动态，下次见面再谈。同时，要求他按地下党的规矩，对我和杜天碧的身份定要保密，更不能随意去打听谁是不是共产党，贸然向人提入党要求，暴露自己。因为他在同我谈话中提到安家场有一个郑重的川北大学学生，言行很象共产党，问我认不认识。我不知道川北工委是否在盐亭建立了党组织，安家场是否已有党员的活动，郑重是不是党员，即便是也不能轻易就去联系，破坏横的关系，万一不是就糟糕，而这一点是袁公卓还不懂得的。

在安家场办完了这件事，我打听到返回梓潼有经石塔铺过河，到兴隆场顺梓江而上的另一条路可走。为了摸清这条路，我按人指点的方向走，比翻大茅山好走多了。回到梓潼，离王朴庵同志约定的见面日期还有一段时间，我便翻出陈子静留给我的地址，在出北门不远的西坝找到了他的家。陈子静也非常高兴我亲自来梓潼跟他接关系，欢迎我在他家里住下，告诉我：他从江油农校回来后通过他周围的关系，了解到梓潼城内中上层社会中一些人的思想状态，不少人误听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顾虑很多。陈子静还告诉我，他已经在城北薛家堰找到一个乡下小学教师的位置，开学后就搬到学校去住，创造接触学生家长的条件。据我观察，陈子静的家庭虽是自耕农，但比一般农户富裕，同社会中上层多少有些关系。陈子静本人业已找到职务作掩护，无论其住家和教书的地方

都距城内较近，消息比较灵通，私下考虑把这里作为我的一个落脚点，便于同各地联络，于是决定他深入隐蔽，不急于发展组织，同我保持单线联系。

把陈子静的工作布置妥当之后，我到城内找到一辆北上的军车，搭"黄鱼"到剑阁武连驿附近农村去找从农校疏散出来的两个党员的地址，结果跑了几个村庄都没有找到，从此这两个党员失掉了联系，后来连他们的姓名也忘记了。这时候，已到8月上旬，同王朴庵同志约定见面的日期快到了。我原来还想去盲师找米维邦的，担心时间来不及，就给米维邦去了一封信，按我们离开农校约定的接头暗号，约他到梓潼城内北街的一家小茶馆来接关系。

三、会见谢子民及其他

遵照王朴庵同志约定的日期，我在梓潼南街上来往旅客驻脚的一家茶馆里找到了他。只见他风尘仆仆，好象刚从绵阳来的车上下来，在茶馆里沏了茶，要了一盆水正在擦脸。我跟他打了个照面，也要了碗茶，装着同行旅客的模样"拿谈"起来。茶馆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高声喧哗，邻座谈话谁也不注意在说什么，我们谈话的声音忽高忽低，夹杂着几句闲聊的空话，当然谁也不会听得明白。我向他汇报了梓潼、盐亭、三台边界之行的经过，建议在三县交界、党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一个支部，接纳杜华云入党等他批准，并听取他对能不能吸收袁公卓入党的指示。经他问过一些细节，批准杜华云入党；对袁公卓申请入党的问题，决定作进一步的考察，可以由我视情况解决。然后，他对时局的发展，提出一些分析判断。据他估计，虽然国民党的统治业已土崩瓦解，但蒋介石政府还将凭借川康易守难攻之险作最后挣扎，从整个格局来看，我西进野战军将迂回桂黔，从川东南突破，截断国民党南逃的退路；我西北野战军则将牵制国民党的胡宗南部队，先扫清甘宁，或许要等川东南突破之后才可能挥师南下。形势果真如此发展，川西北和成都将在川东南和重庆解放之后才会获得解放。国民党军在陕南和川陕公路上有胡宗南的重兵防守，又有秦岭、巴山的地势可倚，必将伙同地方反动势力强化这一带的控制，这就给我地下党的活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他因此指出，我们一定要向基层的同志讲清楚，作好承受严峻考验的思想准备，深入群众，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出适应局势变化而群众又能接受的口号，发动和组织群众，积蓄力量，到时候策应我西北野战军顺利南下。接着，他向我谈到，梓潼地下党组织迟至年初才建立起来，基础差，力量弱，动员江油农校的党员回乡并调我到梓潼，就是为了配合、协助梓潼地下党，加强力量，共同斗争，至于怎么着手，等见到梓潼本地的负责人再一起商议。

我们换了一个茶馆，在中街上，比较清静。这时，来了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身材不高，比较瘦弱，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许正在闹病，他同王朴庵同志打了个招呼，也朝我点了点头，便坐到了我们的身旁。经王朴庵同志介绍，他叫谢芳发，就是解放后更名的谢子民同志。

王朴庵同志让谢子民把梓潼地下党的情况给我讲讲，据他介绍梓潼地下党已经在卧龙山建立了支部，由他和贾文光、陈孝忠三人负责，从江油转移过来的胡奕民，化名"杨正兴"，隐蔽在贾文光的舅父雷银生家里，联系另外三名小学文化的农民党员；城

内有一个小组，三个人，由贾文光发展和领导，还准备在梓潼中学发展三个女学生，再建立一个小组。此外，在梓潼东郊乡下有一个刚从安县回来的党员赵邦雄，同他单线联系。我一边听，一边扳着指头计算，这三处一共有十五个党员，大半是新入党的小知识分子，都还没有经过严格的斗争锻炼。

果然，接下去，谢子民汇报了城内小组出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小组负责人赵德一不太服从贾文光的领导，小组内部三个党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闹矛盾；另一个是赵德一交友不慎，轻易把社会关系复杂的薛崇德、史治家介绍入党，现又发现这两个人同一些特务有交往。谢子民请示解决的办法，王朴庵同志认为，第一个问题要对赵德一多做开导工作，必要时可由谢子民出面调解，或由谢子民亲自来领导这个小组；第二个问题要对薛崇德、史治家两个人的交往严加考察，加强教育，不再忙于发展。最后，约定8月中旬再来梓潼。

我们这次会见到此结束。事后，王朴庵同志才告诉我：梓潼城内的小组可能发生问题，特别是薛崇德、史治家两个人的入党动机可疑，要提高警惕，同时还要对赵德一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和气节教育；他这次来，原先准备在会见谢子民之后建立梓潼地下党领导机构，现在看来条件还不成熟，将另作考虑，由我联系的党员关系暂时不同谢子民这条线发生联系。

这一天下午，米维邦要从百顷来同我接头，我向王朴庵同志汇报了米维邦在江油农校入党前后的表现，入党后还没有正式宣誓等情况。王朴庵同志一听了我的汇报，表示他乐于见一见。等米维邦找到了我，说他回家乡后从朋友中物色到一个党员发展对象，叫高承平，是个教师，经过考察和培养，条件已经成熟，建议这次为其办理入党手续。我告诉他：我们的上级领导人正在梓潼，我们可以一同会见，由这位领导人直接接收，同时为他们两人一道履行入党宣誓仪式。我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对米维邦的信赖，因为他在江油农校曾冒着风险，把校方监视我的活动的阴谋向我通风报信，斗争中经历过考验。王朴庵同志愿意见他，或许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想亲自给他补课，深入讲述一些革命道理。但我毕竟对高承平还不够了解，不认识就让他和米维邦来一齐会见上级领导人，的确十分贸然。黄昏时刻，他们到了我约定的地点，王朴庵同志见了他们，谈了党的性质以及具备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和气节，对形势发展的分析也较深刻，还为他们主持了入党宣誓，同时严肃批评了让高承平参加会见这种不按组织手续、违反地下活动章程的作法。这当然怪不得米维邦，责任在我。其实，我在盐亭安家场碰上杜天碧带袁公卓来找我直接要求入党，已经有了教训，我也批评过人家，现在我在工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失误，则很不应该。

我们分手之后，王朴庵同志回到绵阳。米维邦回到百顷，由他同高承平保持联系，协同工作。我则再去盐亭安家场，会合杜天碧找袁公卓，对袁公卓作进一步的了解。顺道去黄仕钲家，在那里经黄仕钲、杜云华的介绍，又吸收了贫苦农民黄万奎入党，由他们三人建立了一个党小组。

见到袁公卓时，他当面向我交了第二次入党申请书和自传。这次的入党申请书比第一次写的，认识上有了提高；在他的自传中，对他的经历、社会关系也写得比较详尽，着重写了他受革命先烈袁诗尧壮烈牺牲的事迹的影响，从革命书刊中受到的教育，以及

思想转变过程。谈话时，他又对在“为公中学”接受革命思想情况作了一些具体的补充，同时对开展安家场的工作，提出一些具体的想法，问我能不能利用他和袍哥组织“九成社”的关系，打入“九成社”，掌握袍界群众，进而控制伪乡长的反动活动。我依照王朴庵同志在梓潼的谈话内容，给他分析了全国形势，要他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做好上层统战工作，表面上允许“灰色”一点。对他打入“九成社”的建议，原则上同意，但告诫他决不能把袍哥同党混淆，一般不宜在袍哥中发展党员。基于这个考虑，我给他定下一条纪律，不让他承担发展党的任务，组织上只同杜天碧单线联系。最后，我决定由杜天碧作介绍人，由我代表上级领导人给他履行了入党手续。说实在话，尽管王朴庵同志授权给我，可以视情况解决袁公卓的入党要求，我虽然给他办了入党手续，但还是不怎么对他放心的，对他“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便成为他入党以后的事了。

可是，杜天碧在这个时候却提出要继续到江油农校上学的要求，理由是他的父亲不让他呆在家里“瞎混”。我不便硬性决定，勉强同意他秋季开学后去江油，但要他对我到梓潼、盐亭一带的活动保密，即使党内同志也不准讲，如有需要可以通过黄仕钰同我联系。袁公卓的关系则暂时不交，由我定期单线联系。我原先准备在安家场建立三县交界党支部的计划，也因此搁浅。梓潼斑竹槽的罗仕杰，三台龙树乡的龚珍甫和刘少富的关系，只好一并交给黄仕钰，另外成立一个小组，由黄仕钰负责。

为了探寻从盐亭安家场回梓潼的第三条途径，我到三台龙树乡找到龚珍甫，让他领路进入梓潼地界的史家坝，过河在石塔铺一个小客栈住了一夜。沿途，龚珍甫比较沉闷，不愿意多说话，经详细询问，才向我谈到他婚后家庭中的不幸，想离家出走，但又没有门路可投奔。我同他在小客栈谈至深夜，帮他解决思想上的疙瘩，情绪似乎缓和了一些。第二天他回去后，我沿着梓江河岸的大路，翻过几座山坡，到了兴隆乡。过河后再沿着河边走，到了柏林漏，再过一次河，离梓潼就不远了。这一路，三过梓江，等渡船花了不少时间。

回到梓潼，按约定的日期，同谢子民和王朴庵同志碰面，由谢子民汇报上次见面时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处理经过。城内党小组的矛盾，通过贾文光和赵德一之间各自的自我批评得到缓解。对薛崇德和史治家加强教育的问题，经研究决定，由赵德一本照手边上的文件先给他们讲解一点党的政策。另外，梓潼中学学生许志琼、郝学玉、秋天棣经赵德一介绍履行了入党手续，让他们在学校里开展工作。

谢子民接着汇报，赵德一从薛崇德、史治家两人那里听说，梓潼县特务委员会新上任的秘书李秀山正在城乡各地发展特务通讯员，他们建议借此机会派几个党员和可靠群众去充当特务通讯员，打入特务机构，掌握敌特动向。他们已拿到几张特委会发的表格，赵德一认为他和马祖禹、郭亮熙都可以填表。王朴庵同志听到这个汇报，紧锁眉头立即严厉批评，指出我们党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党员打入特务组织的，除非是出于特殊需要，才能由专门负责特工工作的上级组织选派经过严格考核绝对可靠的同志去从事这项活动。而梓潼地下党刚建立不久，都是一些没有经过锻炼、缺乏斗争经验的新党员，岂能担任如此特殊的任务？何况又以一个党小组的成员成批的去打入特务组织，弄得关系混淆不清，万一发生不慎，还会涉及梓潼地下党整个组织的安危。他为此决定，马上终止这种错误作法，决不能给特务机关提交通讯员表格，为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约定我

们在9月初再到梓潼。

王朴庵同志走后，谢子民带我到城外东郊石板河，接通我同赵邦雄的关系，赵邦雄的年纪同谢子民相仿，但身体比谢子民粗壮结实，很健谈。他的家距城六、七里，房子一正一厢，背向梓潼城，面临一座山坡，比较隐蔽。为了对他家里的人掩饰我的身份，我化名姓"汪"，借口曾在安县同赵邦雄一起教过书，现在改做牛皮生意，经常路过梓潼。他家里的人相信了，对我很好，完全象自家人一样。

我们就以赵邦雄的家为联络点，由谢子民回卧龙山去向贾文光、陈孝忠传达王朴庵同志的指示，再由贾文光找赵德一撤销打入特务组织的打算；赵邦雄去城内同进步群众陈元伦联系，通过他在县政府任职的亲戚吕巨衡的关系，探听特委会发展通讯员的动静。我则去西坝托咐陈子静留心城内的变化，抽时间又去了一趟斑竹禧，了解那边活动的进展。

四、破坏与反破坏

在这十天半月内，事态的变化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人意料之糟。梓潼地下党面临遭受破坏的危机。

9月6日一早，我从乡下赶回梓潼，王朴庵同志也从绵阳赶来。这一天城内逢场，赶场的人熙熙攘攘，我们在人群中转到好几处前两次同谢子民碰头的地点，一等再等，都不见谢子民的踪影。下午场散人稀，我同王朴庵同志步出东门，在一个小茶馆坐了片刻，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便出来继续朝东走，快到杨家拐三叉路口，才看到谢子民迎面而来。

王朴庵还没来得及问明谢子民来迟的原因，谢子民赶忙汇报了赵德一的身份全面暴露给敌特的经过，并从进步群众那里传来信息，特务将对地下党来一次大逮捕。王朴庵同志这时表现出他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的沉着冷静，大约他在这多半天没有找到谢子民，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估计到大事不妙。他让谢子民缓了缓气，具体地讲。

原来，薛崇德、史治家两人把赵德一的党员身份早就透露给了特务分子张胜愚、卿文谋和郭明翰，这几个家伙又向特委会秘书李秀山告密。经过他们策划，接收薛、史两人参加了特务组织又让他们在赵德一面前伪装积极。他们为了取得党的活动的真凭实据，趁一次薛、史二人约赵德一去给他们讲解党所颁布的《土地法大纲》的机会，先让郭明翰躲在薛崇德家里的床下偷记，还从赵德一和薛崇德的谈话中偷听到梓潼地下党负责人和上级领导人有时在梓潼接头的情报。特务们定下阴谋，一面麻痹住赵德一，一面明察暗访，妄图找寻时机一举逮捕党的领导人，进而破坏梓潼整个地下党组织。殊不知，特务郭明翰把这件事对他的舅父陈仁文夸耀，说漏了嘴，泄露了特委会的天机。陈仁文是一个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德一。赵德一马上派马祖禹把消息送到卧龙山，贾文光又立刻报告谢子民。谢子民说，这都是最近一两天才展转知道的事，他已布置贾文光到可靠的亲戚处暂避，然后赶来梓潼，担心大白天进城暴露，所以这个时候才从赵邦雄家里出来，也猜想到我们能在这条路上碰见，因为已约定赵邦雄那里是我们的联络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听完谢子民的汇报，王朴庵同志考虑，赵德一可能已经受到特务监视，不能轻易再去联系，但应采取措施，设法使赵德一迅速转移；贾文光是赵德一的联系人，也必须加强隐蔽。估计特务预谋很深，还不会在今夜动手，转移措施留待明天伺机而行。最后，决定谢子民暂时不要回卧龙山，责成我协助他转移赵德一。

当夜，谢子民住到赵邦雄家，我陪王朴庵住进了大街上的"西川旅馆"，找到我认识的那个"茶房"，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床位的单间。夜里，为了防范万一，王朴庵同志让我同他核对了"国民身份证"，发现我们随身带的身份证都是江油县颁发的，且都盖的是江油统驭乡伪乡公所的公章，化名又都姓"王"，于是权且认作"叔侄关系"，编了一套应付警察局半夜查号的"口供"。幸好这天晚上风稳浪静，我们睡了个太平觉，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找到一辆开往绵阳去的过路车，王朴庵同志搭"黄鱼"安全离开了梓潼。

9月7日早晨，我送走了王朴庵同志之后，随即转身到了赵邦雄家，同谢子民一起商量执行王朴庵同志指示的办法。经过一番研究，认为进步群众陈元伦在梓潼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作掩护，平时同赵德一也有交往，最好通过陈元伦去通知赵德一出城同谢子民接头比较稳妥。卧龙山方面，则由赵邦雄带上谢子民给的"暗号"，先去找陈孝忠，再由陈孝忠去转告贾文光注意隐蔽。

这天晚上，我们派赵邦雄进城到陈元伦家，托咐陈元伦设法告诉赵德一在第二天一早趁人不备的时候到梓潼城外南桥桥头，去见一个姓"周"的。所谓姓"周"的，是谢子民遵照王朴庵同志的指示，前不久为协调赵德一不服从贾文光领导的矛盾，给赵德一做工作时使用过的化名。使用这个联络"暗号"，赵德一当然懂得是上级领导人准备见他。而这种关系，作为党外群众的陈元伦却是不知道的。

9月8日早上，我拿出两块银元交给谢子民，嘱托他见到赵德一时就交给他作路费，马上朝绵阳方向的魏城转移，找个不显眼的小客栈住下，等待组织上去给他接关系，再作进一步的转移。同时叮咛赵邦雄去卧龙山要提高警惕，给他安排了几条注意事项，把事情办妥就赶快回来。等谢子民、赵邦雄出门，我便进城找机会观察动静。

这一天，城内又逢场。我在南街上一个摆香烟的铺子门口碰见高承平，他告诉我，这个铺子是他姐夫开的，拉我进去坐了坐。这个铺子很窄，除一间铺面外，里间就是他姐姐、姐夫的卧室。我趁没人，简要的把特务要抓人的消息告诉了他，叮咛他如听到情况要镇定自若，不能惊慌，如能探听到什么消息就立刻告诉我。高承平可能是为了我的安全，整整陪我大半天，约我下午再到他姐夫这里来。下午我去的时候，他已坐在铺子门口等我，马上告诉我有个姓赵的被特务抓了，但在哪里抓的还不知道，敌伪"自卫队"已在几道城门加岗设哨，说不定晚上还要戒严，全城搜查。

我一边听，一边琢磨，赵德一会不会是在城外南桥被抓的？如果在那里被抓，会不会牵连到谢子民？如果谢子民也被抓，赵邦雄的家那边也会出问题了；听说城门口加了岗哨，我出城遇到盘查难免危险，假如在城内住旅馆遇到搜查也不安全。我便向高承平提出，今夜能不能暂时给我找个地方过夜？他想了想，对我说，他姐夫这里太窄，外人借宿不方便；但又说，有个地方倒可以住，问我"敢不敢去"？我要他详细讲讲，他才告诉我，梓潼县伪参议会的参议长谢润田是他的姨父，住在西街，同他们家的来往虽然不多，但他有时也去去。我忖度了一下，料想参议长还不是职业特务，特务抓人同他干

系不大，何况又有高承平这位他家的亲戚陪我去，大致不会引起怀疑，于是答应高承平，等晚一点再去，说不定这里还最安全不过。

待到上灯的时候，高承平把我带进谢润田家，安顿在堂屋隔壁的卧室里，抽身出去给他的姨父说，他有一个客人从江油绕驷乡来，路过梓潼到绵阳去，同他在这里暂住一夜就走。我听见谢润田问：城里头今天抓了一个共产党，晚上还要搜查，你随便带人到我家里来住，可靠不可靠？高承平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几句话，虚与委蛇地给谢润田打了一个“保证”，他也就没有再问什么。

说来也巧，我和高承平住的这间卧室同谢润田的堂屋间隔着一张板壁，板壁靠床处窟窿，透过这个窟窿不仅能把堂屋里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从室内暗处窥向堂屋明处，进出的人影走动也绰约可见。这一夜真不安静，先听到赵德一的父亲前来作揖磕头，拜托谢润田给特委会求情，释放他的儿子，谢润田没有答应；隔了一阵，赵德一的父亲托了一盘银元进来，定要谢润田给特委会讲个人情。毕竟是钱能通神，谢润田终于答应了。天快亮的时候，又有人来报信，说赵德一在特务的人证物证面前招认了，承认他是一个共产党，被关进了监牢。我暗暗吃了一惊，不知道赵德一还招认了些什么，供出了哪些人？

不等天明，我叫起高承平，跨出谢家大门，直奔南街观察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人拦路盘问，便随出城的人流一道出城。分手时，我吩咐高承平回去再探听一点风声，同时去给百顷的米维邦送个信。然后，我顺河边绕道到了赵邦雄家，只见谢子民在门口等着，我心里挂着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但赵邦雄还没有从卧龙山回来。我把昨天白日夜里听到看到的，一一向谢子民讲了，由于赵德一被捕，我们十分担心赵邦雄同陈孝忠接头是否顺利？情报是否及时送到了贾文光手里？他是否又作了进一步的转移？我们分析了种种可能，对贾文光的安危实在放心不下。为了稳妥起见，我要谢子民到南河路边去等赵邦雄，如遇变故也立即转移；我则从东郊小路绕到西坝找陈子静，向他通报了赵德一被捕的消息，要他尽力探听事后发生的情况。

按约定的时间，晚上我又回到赵邦雄家，赵邦雄和谢子民都已在家里等我。这时才知道，赵邦雄在进步群众陈元伦那里打听到，贾文光在赵德一被捕的当天半夜，也被特务逮捕。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一时弄不清楚，究竟是赵德一在狱中供出了贾文光呢，还是贾文光平时同赵德一联系就为特务查觉？我又联想到，事态万一进一步恶化，就会牵连到卧龙山支部和城内两个党小组十几个同志，梓潼地下党将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说不定还会影响到绵阳、江油和其它地方一些同志的安全。因为，我向谢子民详细了解，贾文光在卧龙山不仅掌握当地的党员关系，从江油转移过来的胡奕民也通过他隐蔽在那里，而胡奕民在江油、中江都有关系，据我所知，原江油中心县的李英、韩光烈也曾到卧龙山同贾文光见过面；赵德一知道的关系虽然不多，但身为川北工委委员的王朴庵同志在此之前到梓潼时曾经同他谈话，对他进行过党的教育，而且还曾在他家里住过，这次谢子民又化名姓“周”在南桥同他接头，实际上进一步发生了党的关系。我们对赵、贾两人被捕后在敌人逼供面前的表现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对党的忠贞程度我也没有把握，怎么不令人着急呢？

我和赵邦雄交换了情况，又了解到贾文光虽然同赵邦雄没有党的关系，但过去彼此认识，他还曾到赵邦雄家里来过。卧龙山防备不慎的教训提醒我们，这个时刻我们三个

人同聚在这里很不妥当。正在商量如何转移，陈元伦冒着大雨，趟过赵邦雄家房背后青龙桥上齐腰的洪水前来报信，说特务还将采取行动扩大搜捕范围，企图一网打尽梓潼地下党，捉拿党的领导人。这是我初次见到陈元伦，他脸色苍白，身躯瘦弱，但还不知道他正患着肺病。他当时作为一个党外群众，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为保护地下党而不顾个人安危，真是难能可贵！这次事件过后，经赵邦雄介绍，由我吸收他入党。解放时他为迎接解放军入城和后来支援路过部队的粮草作了许多工作，可惜终因病重，解放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这天晚上，我们向赵邦雄家里的人撒了个"谎"，说县政府"要抓壮丁"，我们要出去躲一躲，临时转移到赵邦雄家对面半坡上一个庶农张玉金的家里，在屋檐下可以望见梓潼城内若明若暗的点点灯火，居高临下，监视着四周的动静。夜里，风雨淅沥，我们在屋檐下决定，既然贾文光和赵德一都已被捕，谢子民就不能再在梓潼露面了，必须马上转移。卧龙山支部和城内郭亮熙，马祖禹以及许志琼等人的关系，暂时停止，等适当的时机再设法联系。为了把梓潼的消息及时地向王朴庵同志汇报，我必须先到绵阳去一趟。谢子民则由赵邦雄护送到他的一个亲戚家去暂住几天，等我从绵阳回来后再作下一步的转移。

9月10日，赵邦雄陪同谢子民去他的亲戚家。

我随即去绵阳向王朴庵同志详细汇报了贾、赵被捕，谢子民转移，以及初步掌握的赵德一在狱中的表现。王朴庵同志对梓潼地下党工作不慎的失误和贾，赵两人的被捕深为惋惜，对党没有遭到更大的破坏又感到宽慰，但指出，还必须提高警惕，注意贾、赵在狱中的变化和敌特动向，防止特务"放长线、钓大鱼"他因此同意我暂停卧龙山支部和城内两个党小组联系，决定谢子民下一步转移到梓、盐边区去的建议，并把那边的工作交给他负责，建立"梓、盐、三"三县边界支部；同时指定我负责梓潼城区的工作，依靠东坝、西坝、百顷的本地党员把梓潼组织重新建立起来，继续做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迎接胜利的工作。还鼓励我，敌人要破坏我们，我们就针锋相对，坚决进行反破坏的斗争，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使敌人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最后，王朴庵同志约定我10月初再到绵阳汇报工作，研究下一步的布署。

我从绵阳返回梓潼，先到陈子静在薛家堰教书的那所小学暂住。他告诉我，赵德一、贾文光被捕的事，梓潼城内众人皆知，据打听到的消息，他们都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却只供认梓潼只有他们两个。上级领导人的名字，赵德一供出一个叫"老王"，一个叫"老周"，贾文光则拒不交待。特务没办法深追下去，只能对卧龙山加强监视。由于谢子民在贾文光被捕之后没有再回卧龙山，因而也成为特务追捕的对象。为了更为妥善地隐蔽谢子民，待我回到梓潼之后，便把盐亭安家场杜天碧的地址和接头的"暗号"交给了他，指明通往斑竹槽去安家场的路径，由他先去安家场同杜天碧接头，在那边等我。赵邦雄则疏散到更远一处亲戚家去"躲壮丁"，随时打听有关搜捕地下党的消息，观察动静。由于地下党领导的正确分析，采取了灵活而又坚定的策略，基本上保全党组织的安全。

五、迎接解放的斗争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在梓潼，因为贾文光、赵德一被捕，许多人都知道本地就有共产党的活动，不少素抱革命要求而难以如愿的仁人志士这时都急于找到党的踪影，投身于解放事业，广大群众渴求解放，更如大旱久望云霓。

我从百顷回梓潼，先在陈子静教书的学校探听到敌特9月大搜捕的阴谋失败，气势已有减弱的情报，估计赵邦雄可能回家了，便到东坝找他。我不知道赵邦雄的住处是否受到特务监视，在他家对面山坡上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现象，才进他家去。我9月10日离开他家时，借口是躲避"抓壮丁"，这时回来，他里家的人不免关心地问东问西，我仍以做牛皮生意为托词，给他们编了一段"生意经"。他家里的人都不在意，倒引起了当时在场的赵邦雄的朋友张天培的猜疑，一定想从我的嘴里打听出我的来历，而且脱口直问："汪先生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尽管有赵邦雄替我掩盖，但他不信，我从他那点"狡黠"的神态表情中，料他也猜中了五、六分。于是他便向我大谈特谈他受土豪劣绅恶势力的迫害，组织"励进学术会"，长期混迹于川西北各地，交朋结友、扶弱拒强，乃至帮助女学生逃避买卖婚姻等种种游侠似的故事。谈话时义愤填膺，大有同国民党恶绅统治势不两立之慨，却又带点江湖气。他还约我同他"结伙"，趁国民党彻底垮台之前抢枪夺粮，举行"暴动"。看来，他可能真的把我当成了共产党，以为我在梓潼埋伏了不少人马；或许把我视为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以为我手下掌握了好多"天兵天将"！

据赵邦雄背后向我介绍，张天培讲的他受迫害都是实话，"励进学术会"是一个以贫苦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间进步组织，张天培是初期的发起人之一。此人虽然带点江湖色彩，但出身贫苦，也不是哥老，还可以信赖，可以深入交谈，给于帮助教育。出于赵邦雄的建议，我明确表示对他要举行"暴动"的那种幼稚蛮干的动机和不顾主客观力量对比的盲动行为不以为然，并向他指出，梓潼城乡已遍布国民党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军警林立，又有特务监视，万一贸然行动，只会召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堪后果，劝他适应群众要求，埋头多做扎实的点滴工作。但他不听，反而责怪我胆小怕事。自从他认识了我，也知道我常到赵邦雄这里来，便三天两头来找我，一见面就为"暴动"问题同我发生争执。我感到此人是个"勇敢分子"始终没有向他暴露身份，也不便向他挑明梓潼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之后尚待重新组建的秘密，于是尽量回避他，见面也不再同他争执，对他设想的"具体暴动计划"拒不支持。直到梓潼解放的头天晚上，他伙同几个朋友，手执棍棒、锄头、砍刀，在梓潼城外大佛寺河边拦击国民党溃军，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几十颗手榴弹和几千发子弹，并把武器上缴，作为梓潼解放初期维持社会秩序之用。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解放后受到冤屈，前几年多次申诉，却夸张其词说，梓潼解放前有一支"由王岳同志亲自领导的张天培亲自指挥的地下军"，还进行了一场"大佛寺战役"这就不顾事实，显得神乎其神、令人啼笑皆非了。

在这个时期，赵邦雄向我汇报了他在各处扎根串连的工作，提出了几个党员发展对象，有的经过培养提高、条件已经成熟，建议我抽时间同他们谈话，正式吸收入党。其

中，陈元伦经过卧龙山事件的严峻考验，最先吸收。鉴于他在城内存在特殊社会关系，便让他继续担负刺探敌情的任务，单独同赵邦雄联系。随后，赵邦雄交来了郑家杰、赵邦统、赵德琦的自传和入党申请书，据赵邦雄介绍，郑家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参加了“励进学术会”，读过一些进步革命书刊，曾经参与学校中的反蒋斗争，觉悟较高，且有办法通过关系控制兴隆乡的地方武装；赵邦统是马鸣乡人，能掌握警察中队，直接控制着该乡的枪枝弹药，必要时这两个乡的武器可以为我们利用。此外，赵邦雄说，在积极分子中可以发展入党的，还有张如福、陈仕洋、王宗孔、张明荣等；住在赵德琦家里的一个从绵竹来的失业知识分子徐避，正在设法投奔陕北，经过一段接触了解，也可以发展入党，让他回到绵竹去，因为赵邦雄在绵竹那边有过去的关系可以接上。根据赵邦雄的建议，我先从他介绍的名单中挑选出郑家杰，在东门外茶馆里同郑家杰作了一次谈话。

就在这个期间，国民党四川统治当局为维持其苟延残喘的局面，妄图在其覆灭之前作垂死挣扎，下令各个专区举办“反共游击训练班”，梓潼伪政府则奉命从各个乡镇抽调人员前往绵阳专区接受训练。郑家杰不明究竟，在“励进学术会”负责人张天培的怂恿下，误认张天培为“地下党员”，以为要他去“游训班”受训是地下党组织的派遣，便去绵阳“受训”二十一天。当我第二次同郑家杰谈话时，发现了这个情况，要他写了两次书面交代，还考虑他能不能入党的问题。经我同赵邦雄分析研究，认为发生此事同郑家杰历来的政治表现不符，而同张天培一心想“夺枪暴动”计划倒颇吻合，因而认定他去“游训班”受训确非出于不纯动机，仍决定由赵邦雄作介绍人，我代表地下党组织在塔子梁河边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入党后，同意他凭借他同兴隆乡伪乡长郑家印是同族堂兄弟的关系，去充任兴隆乡“民众自卫队”队长，以公开身份掌握这个乡的全部枪支。

在梓潼，伪县长赵学全在策划组织“反共自卫救国军”，自兼司令，以乡为单位“建营”的同时，又纠集一伙人搞了一个反共组织“南山救国会”。为了弄清敌情动向，趁“南山救国会”在梓潼中学举行“成立大会”的机会，我同赵邦雄商量，由他去冒充“列席”，探明这个反动组织究竟要搞些什么名堂，以便采取对策。听赵邦雄回来说，所谓“南山救国会”的“成立大会”，开得稀稀拉拉，几个跳梁小丑在台上胡诌了一通反共滥调，空嚷了一通反共口号，响应者寥寥便宣布散会。看来，这是几个敌特利用某些小有产者的惧共心理，在他们的末日到来之前，再强化一次反共舆论，为他们自己打打强心针而已。我们对敌伪这些动态进一步分析，认为敌人营垒的种种“应变”准备，表明我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川的时日已为期不远了，梓潼地下党必须加紧布置，在这个时候定需放手发动群众，才能策应解放军南下。

10月底11月初，我人民解放军从贵州、湖北、甘肃、陕西几个方面向四川挺进，国民党胡宗南驻守在秦岭、巴山一带的部队开始经陇南和陕南分几路朝四川境内撤退，消息传来，我们非常振奋。梓潼敌伪当局，这时也赶紧抽丁筹款，向人民横征暴敛，进行所谓“保民”动员，闹得各乡镇鸡犬不宁。我们连夜分析形势，认为敌伪扰民过多过重，群众自发的议论和反抗必然愈来愈烈，这就为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大好时机，于是立即布置党内外积极分子和可靠群众，因事利导，用走乡串户以及赶场、赶庙

会和结伴上路的各种形式，发起“抗拒当壮丁”、“抗拒交公粮”、“抗拒苛捐杂税”“抗拒给地主交租”，“能抗就抗，抗不住就拖”的斗争，这些号召马上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和支持，以口为碑，一传十、十传百，后来归纳为“四抗”，在好些乡镇加以推广。与此同时，为防止敌伪临近解放时的破坏，防止国民党溃军和土匪趁混乱时抢劫，防止上敌伪反共宣传的当，有的地方又提出了“三防”的口号，或“不当兵，不纳粮，不给国民党溃军引路”的“三不”口号。有的乡镇则提出“护仓、护粮、护枪”的“三护”口号，为解放军路过梓潼支援粮草供应，维护社会治安作出积极的准备。

在这场斗争中，赵邦统、赵德琦、张如福、陈仕祥先后被吸收入党。经赵德琦介绍，又吸收了杨开达、席怀刚、王治民、杨淑嗣（女）和雇农刘成鑫入党，在梓潼北郊建立了一个党小组。以后入党的，还有王宗孔、张明荣。到梓潼解放前夕，地下党和团结在我们周围的力量，包括几个乡镇上为我们控制的武装，已分布在城区的东坝、西坝、北郊和百顷、兴隆、马鸣、定远、双龙等地，同江油的中兴、马鞍寺、盐亭的安家场和三台的龙树乡连成一线，相互呼应。卧龙山的支部虽遭破坏，党的活动受到敌特监视，但陈孝忠、雷锟生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形式，组织群众进行着斗争。

11月下旬，我算是最后一次去向王朴庵同志汇报工作。从梓潼到绵阳，沿途住满了国民党从陕南败退入川的部队，一些关隘路口还增设了岗哨，盘问过路行人，据说是盘查“共军的先遣侦察人员”和“土共”。我在涪江浮桥桥头，也遭到一个丘八操着一腔浓厚的北方口音，盘问：“打哪儿来？去哪儿？干啥的？……”我亮出“护身符”——“国民身份证”，居然混进了绵阳，在一家人进人出的大茶馆里找到了王朴庵同志，只见他穿着一身毕挺的毛料长袍，派头十足，俨然象一位上层社会的“士绅”或“教授”之类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则一副土打扮，同他谈话很不相称。我不便久留，只能简要的向他汇报了一下“江彰平梓盐”工委建立之后梓潼地下工作的进展，接受几点指示，就告别了。晚上，我在一家小茶馆里临时租了三张茶桌子拼起来勉强住了一夜，因为全城的大小旅馆都被国民党的部队占了，有的成了什么“指挥部”，有的住进了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太太、少爷、小姐。第二天我匆匆赶回梓潼，梓潼也成了兵山一座。

我正打算到陈子静那里去，走到北街，突然感到肩头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我转身一看，是一个素不认识的年轻人，不高的瘦瘦身材，脸上一颗明显的黑痣。他挨着我的肩膀，埋着头压低了嗓门，说有事找我。我正感到纳闷，抬头望见前面不远的一个部队营房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猛然引起我的警惕，该不会碰上了特务？我耐着性子立刻让在一边，叫这个人先走一步，到北门外一家茶篷子里面去等我。等他走远了，我回头溜出东门，赶到赵邦雄那里去谈了这个遭遇。经他核对我描绘的这个年轻人的身材、相貌，赵邦雄才顿时想起：“是赵德一，没错！”并惊讶地问：“他什么时候给特委会放出来的？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这时我更加奇怪：我到梓潼之后从来没有同赵德一接触过，他怎么能认出我？是他弄错了人，还是他从我身上或行迹什么地方把我当成了地下党？又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我们作了种种分析和估计。最坏的估计是，赵德一叛变成了特务，充当了特务机关的鹰犬，到处嗅寻他认为可疑的人，伙同其他特务安下圈套，诱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